

## 新书点击

# 世俗其实也是一种人性

## ——读李宗陶《画在人心的苦闷上》

□雨 蓓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在接受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一些新闻努力炮制鲍勃如何对诺奖不屑一顾时,先是作为艺术家然后才是文学家的鲍勃却作出了令他们失望的选择。

鲍勃未能按照一些人想当然预设的脚本,这是令人意外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戳中大众对于艺术的认知误区,即越是有高度的艺术家,越应与世俗水火不容,挥刀斩断与金钱间的那些万缕千丝。与世俗隔绝,越来越像是衡量艺术水平乃至道德的一把尺子。所以,艺术家面对世俗总是小心翼翼,即便难避金钱话题,往往也得精心包装,修辞婉转,深怕落得骂名。

多年来以采访文化艺术名人为长的李宗陶,一直以来习惯带着问题上路。本书中,她以一贯的凌厉作风,与李安、张晓明、徐冰、老树、毛焰、邱志杰、何多苓、罗中立、周英华、刘晓东、耿建翌、川美77级油画班、凯伦·史密斯、加里·格拉夫曼……等艺术名家“促膝”长谈并展开尖锐的交锋思想,不经意间偶露这么一些规律,即在共同回顾艺术创作过程时,不可避免地“波及”世俗——在采访的绝大多数画家时都

提及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画作价格,有的看似只是一语带过,但分量也已纤毫毕现。

近年来画作大红大紫的张晓明,虽着重谈他追求艺术高度的艰难历程,但最后也是以他的画作价格层层上涨用作形容艺术高度的修辞。类似的还有周英华、老树、朱新建、何多苓等。对于世俗,刘小东的一席话倒是一针见血,“在我看来艺术家是介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一种动物。如果完全出世,那人活不长。如果完全冲着名利,艺术活不长”。很显然,在谈到“出世”问题时,刘小东回避了“艺术家”这一特殊身份,而是以“人”这一社会属性取而代之,这不单单是为了避免公众的不屑乃至谩骂,更在于道出世俗本来是“人”的这一本质。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在《画家生涯》中就曾描述了中国古代美术家的辛酸往事:除个别画家投靠权势或豪门外,大多数画家视金钱如粪土,但又都生活拮据,不少人不得不靠中间人转手画作换取收入。久而久之,专门靠转手倒卖画作的中间人应运而生,此即捐客。当然,在市场经济社会,捐客身上的历史灰尘早已掸去,虽不至于伟岸,但也不至于在道德上遭受什么质疑。

诚然,许多艺术的诞生往往出自于对世俗的本能抗拒,就像川美77、78届画家群体以“伤痕”的方式,

对历史进行了反思,毫无疑问张晓明正是这一反思群体中的佼佼者。不过,艺术又似乎永远无法脱离世俗而独立存在。老树说,“我们老讲古代人活得有诗意,其实那就是生活的样子。为什么现在的人没有诗意了?因为没那个生活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没有世俗生活,艺术便有如无本之末。

近代最不讳言谈钱的可能要数张大千大师了。大师一生精品无数,似乎对商业也多有研究,但这丝毫不能遮掩他的艺术光芒。这也并非是说,艺术家就应“向钱看”,毕竟只有与世俗保持距离,艺术家才可看得更为真切,思考更为深入。

换言之,艺术家可以不在乎世俗,但如果因世俗而一味对抗,则又显得过犹不及。在“2016年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当谈到自己这些年的采访经历时李宗陶说,“我是在找人性,二是在找一种荒诞的东西——它不合理,但是它存在,存在了很久。还有,我想告诉大家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说的“本质”的东西里包不包括世俗,但世俗肯定“存在了很久”,只要有人的地方也一定有世俗,因为世俗本来就是人性。或者说,没有世俗的生活,便不会有源自生活的艺术。

(《画在人心的苦闷上》,鹭江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 悦读笔记

## 苛刻之爱

□欧阳娜

康熙年间,有人在书店买了一部《吕氏春秋》,不小心将一枚铜钱掉落在地上。一个秀才用脚暗暗踩住那枚钱之后占为己有。秀才旁边坐着一个老头,老头站起来问了问秀才的名字,冷笑两声后走了。秀才是国子监的助教,后来调动时他选了常熟县知县的职位。就在秀才收拾行装准备赴任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汤潜庵却传令通知此人不必赴任,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检举弹劾的公文中了。秀才质疑:“我因何事而遭到弹劾?”答曰:“贪污!”秀才申辩:“我尚未赴任,哪来赃款?”汤公说:“你还记得当年你在书店里做过的事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钱如命,你侥幸当上了地方官,岂不要伸手到人家口袋里去取,成为乌纱帽下的窃贼吗?”秀才此时才知道当年的那个老头竟是今天的汤巡抚,他只得惭愧沮丧地辞官而去。

笔者初读这个故事,除了为那个小秀才的不慎其独而悲哀,也多少觉得那个汤巡抚有点过于苛刻了。汤潜庵究竟何许人也?他会不会是一个心胸狭窄、吹毛求疵的人呢?原来,汤潜庵即清代八大文正公之首的汤斌,睢州人,顺治九年中进士及第,康熙时任江苏巡抚,一生政绩卓著,为官清廉,很受百姓拥戴。

汤潜庵胸怀宽广极能容人,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汤潜庵前往江苏赴任时,布衣牛车,仅一老夫相随。主仆途遇一位知县,却是华丽车马,仆从云集,威风凛凛。知县的家奴见汤潜庵的牛车在前,怒斥汤潜庵主仆避让,汤潜庵不与其计较,悄悄让开。一品巡抚的牛车避让七品知县的车队,古今罕见。汤潜庵途中住店时又遇到那位知县,不想那位知县竟得寸进尺地逼汤潜庵让房,汤潜庵依然宽忍让之。知县后来闻知遇到的汤潜庵乃新任封疆大吏时,惭愧万分,无地自容。康熙帝闻知此事,赐汤潜庵一匹宝马作为奖励。

说汤潜庵苛刻倒也不假,但他的苛刻只对自己。为官几十载,他未曾贪贿一钱一文,也未曾接受一分一毫的馈赠。冯景所作的《汤中丞杂记》记载,汤潜庵在巡抚任时,其夫人和诸公子皆粗布衣裳,每天吃的就是府衙后面的野菜和一块豆腐。常州知府祖进朝知他生活清苦,专门为他缝制了一套衣靴想要送给他,可好长时间不敢和他说起这件事,最后只好自己穿上了。汤潜庵生日那天,一个下属知道他拒不受礼,特地订制一扇围屏为他祝寿,汤潜庵坚辞不受,下属面色为难地打开围屏说:“汪琬撰文在上。”汤潜庵于是让人拿到堂内抄录下来后再退还其围屏。汤潜庵离任离开江苏之日,行李只有两篓旧书。

可汤潜庵爱民则惟恐不周。康熙南巡至此,总督为了讨好皇帝,大修御道,甚至要拆毁百姓的房子,汤潜庵竭力阻止。康熙到后奖励他:“此事颇合朕爱民之意。”有官吏上报说菱芡熟了,按规定和惯例要收税,汤嗤之以鼻:“尔知今年熟,明年熟否?且援以为例,试问尔菱芡能有多大出息?尔辈亦不欲小民稍事糊口,必使喘气不得而后可,汝之肉不足食矣。”于是原来的惯例被免掉。

以汤潜庵之聪敏,之爱民,之仁厚,焉能不知前程于书生之重要,但他更知操行的重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微杜渐,不可不察!那个轿夫的故事他比谁都清楚——轿夫穿了一双新鞋,时时注意,害怕踩上泥弄脏了;可一不小心,他的一只鞋踩上了泥水,之后他就没有了原先的警戒之心爱惜之意,也就毫不在乎脚下甚至一身的污浊了。汤潜庵虽然阻断了小秀才的为官之路,但也同时阻断了他由一钱而千钱万钱、以至终将踏上杀头的不归之路。铁窗之下,刑场之上,多少哀号涕泣之人慨叹自己没有遇到过这样苛刻呀!小秀才虽不能当官,但他还可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人,还可以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尽享天伦之乐。

由此看来,汤潜庵的苛刻不仅没有害那个小秀才,反而挽救了一条可能会糊里糊涂懵懵懂懂丢掉的生命,同时也无形中为朝廷和百姓消除了一只硕鼠。这样的苛刻难道不是善莫大焉吗?

## 百家荐书

# 人性在道德博弈中日趋完美

## ——读《道德博弈》

□刘英团

“我们的晚餐并不来自于屠夫、啤酒酿造者和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源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一如亚当·斯密所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在《道德博弈》一书中,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和管理学教授保罗·扎克和他的研究小组通过几千个实验证实,人的大脑里存在着一个“开关”。打开开关,人们就会变得慈爱 and 慷慨;关上开关,人们又会变得暴力和贪婪。他将其称之为“人类大脑中的道德分子”。

动物界里也有很多“类人”化的“道德行为”——某些动物对同类在困境中的行为令人类汗颜。比如,在对恒河猴的实验中,它宁肯挨饿好几天也不肯通过拉动一条链子得到食物——因为这个动作可能为同伴带来电击。从猴子和猿类的社会性行为中,埃莫雷大学德瓦尔博士“看到了道德的源头”。尽管“诚实为上可能是一条良好的一般规则……一个既遵奉一般规则又从其所有例外中获得好处的人是在以极高明的智慧行事”(休谟《人性论》),但“从非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柏拉图《理想国》),或者“假定我们发现……理性除了在决定事实时发挥作用之外,在行动领域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我们发现理性只是利益的女仆,那么超越利益的道德要求就必定也与理性相矛

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像传统上的构想那样,道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大卫·高塞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同一社会中共处?

道德有着其绝对的道德原则,而不论其结果如何。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作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谓的“他们自己的利益”不仅意味着价值的转移,还使得其以一种崭新而全面的方式解释人类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这还是人类社会成果之争。”保罗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价值绝不亚于《国富论》——离开了《道德情操论》不但无法理解《国富论》,还会“走上歧路”。他强调,要高度警惕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对社会公益的损害,“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

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对道德的强烈诉求,并不能掩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黑格尔不满意康德抽象的“善良意志”学说,他主张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解决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保罗认为,“道德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物……而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生存策略,是自然选择和最严苛的现实主义者锻造出来的行为”。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强调的伦理与道德概念的区别,“正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它不去利用他人,不去寻求免费品或强加无

偿的成本,只要一个人假定他人也有同样的倾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面的利益……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诚如保罗所言,“这是一个极好的理论”,“良性循环仍然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道德标准衡量着我们对同一事情的不同理解和思考,“除非简化为事实问题,否则,对有争议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令人信服的答案”(理查德·A·波斯纳)。在《道德博弈》一书中,保罗开创性地剖析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情感,以及人性的善与恶。比如,为什么有些男性对自己的伴侣很忠诚,有些则很花心?为什么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慷慨、更宽容?为什么我们有时是理性的,有时又很冲动?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理性的与合理的……不能认为两者间存在任何相互推导,尤其是不能认为可以从合理的‘理念’中推出理性的‘理念’”。康德也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结果赋予的,而是与行为的动机有关系,即“善良意志”。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我们是有理性的,有能力进行自我选择,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选择才使得人们具有了尊严,尊重人类的尊严,意味着不仅仅要将人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要将人本身视为目的”。如果只遵从于简单的快乐或痛苦,那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

(《道德博弈》,(美国)保罗·扎克著,黄延峰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版)